

化則更多筆墨集中在還原出一個典型案例，發生認同轉化的背後，土著社會當地是否發生過階級層面的變動，筆者認為可進一步論述，畢竟，新階級的誕生才能標誌着一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轉化。

最後，本書土著化書寫所用的材料都是漢文移民史料，甚少雲南本土材料，也和作者導言中所說的缺失雲南本土人物的書寫相對應。例如本書第四章的三國時期，作者將當今西南流傳的諸葛亮故事的傳說看作是中國人的發明（頁152）。實際上這些傳說更可能是明清雲南本土人群為了自身社會秩序能夠在新的王朝中得以維持，進行的自發式書寫創造。董子昂書評中曾評論「作為區域的雲南是關心雲南本身；作為自我認同的雲南是將雲南作為通往中心的路徑，解決中心的問題，本書明顯屬於後者。」如若從「關心雲南本身」出發，去理解「雲南人」在歷史進程中所做出的每一個選擇，「何以雲南，何以中國」的問題也許還會有全新的解讀。

劉雅君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程美寶，《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327頁。

從《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到《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程美寶歷經15載，目光逆歷史之河而上移至18世紀。她對作為區域的「華南」和文化史的關注貫穿前後兩本書。她始終關心的是：在某些歷史關節點，「華南」作為一個「區域」所經歷的宏觀社會變遷，而經歷着這些的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各顯神通，參與文化建構。但新作試圖超越舊作的努力也顯而易見。作者將歷史人類學對基層社會運作的基本關懷引入文化史研究，打破「文化是讀書人的事情」的慣常思路，把因不善文書而鮮少留下歷史印跡的普通人從史海打撈出來，還他們一個「締造世界的先行者」的名分。筆者作為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讀罷這本小書，在方法論層面感到深切共鳴，在實證發現層面收穫啟發的靈光。

一般認為，文字是進入知識世界的基本媒介。這本書卻解答了一個有趣的悖論：在清代的廣州口岸，那些不怎麼識字的人又是如何參與知識的跨文化傳播和生產呢？作者用心琢磨和拼接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字碎片和圖像資

料，試圖再現當時那些為外國人提供日常生活所需服務的普通人，如何在資源有限到言語不怎麼通暢的狀況下，使盡法寶謀求生計並成為跨地域文化創造的主體。雖然作者是歷史學家，但在結構編排上它更像是一部民族誌作品。除首尾的「弁言」和「序曲」兩部分外，主體四部分的編排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從有名到無名」的漸進式結構。開篇起於個人機遇，以僮僕黃東的故事展開。隨後推廣至群體，分別聚焦僕人、家廚、引水人等活躍於珠江口的小人物及他們與洋商為伴的日常生活。最後探討18世紀中外交往中的知識互通如何可能，尤其是知識世界中「翻譯的技術」，從而總結知識跨地域傳播和生產的核心機制。

該書第一部分從客居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布萊克身邊的僮僕（省城土話稱為「事仔」）黃東跨越中英，與洋人交往的生活軌跡講起。他到訪並寓居英倫，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兼備中英兩國語言和文化的人。他生活的時代，恰逢歐洲從18世紀「品鑒賞玩」之風轉向19世紀「格物致知」的科學態度。他在服務熱衷收藏分類中國瓷器的英國貴族過程中，自然參與早期探索中西曆換算，並協助洋人認識中國瓷器，建立中國陶瓷知識體系；後期，他受相熟的英國知識分子朋友所託，將中文植物典籍遠赴重洋送至其手，使中國植物知識整合到全球植物譜系成為可能。綜觀其一生，他以不同身分與興趣不一的英國上流社會人士交往，不經意間成為他們眼中的「中國通」和全球知識體系與中國地方知識互通的橋樑。第二部分聚焦洋商的家廚所實踐的「西學」和知識轉移。中國傭人根據主人的需要，學習一套處理西式餐具和西菜的做法，還因地制宜混用本地和外地食材，用粵語音譯不同西式烹飪手法。主僕日常頻繁溝通的需要，成為早期粵英語言互譯系統發展的重要動力。第三部分的主角是比僕人和家廚更卑微的「引水人」。這些熟諳珠江口複雜水路的水上人，長期為洋船從澳門到虎門再進黃埔的航程領航。他們發展出一套集簡單外語詞彙、手勢、火炮、鑼鼓、火炬、火箭、彩色旗幟等為一體的資訊交換系統。除此以外，作者更透過清代民國流傳的口訣和歌謠琢磨和想像引水人生活中銀元、食物、生活用品等物質文化交流的實踐。第四部分進入文化交流的核心議題——語言，探討當時普通中國人如何在條件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發展出相當有創意的學習、使用和教授英語的「技術」。作者發現，粵人學習英語出於實用性的需要，故從口述性出發，經歷從口耳相傳到文字化，從粵語音譯到簡單英語書寫的過程。為了應對這種重口述而輕書寫的外語學習方式所帶來英語書寫能力不足的問題，粵人在複雜社交場合靈活地採用「個人口授—請人代筆—口述覆核」的「雙向對話」翻譯方

式，從而實現跨文化交流。

通過呈現黃東等小人物的跨地域生活以及他們如何參與全球知識的交流、傳播和生產，這本書為既有中國歷史分期帶來新的認知——過去我們往往更關心在「傳統-現代」敘事下作為大變局時代的19世紀，而黃東們的故事卻提醒我們不應忽略「漫長的18世紀」；這一時期的社會看似停滯卻變化微妙，向上繼承17世紀甚至更早的傳統，向下為19世紀大變局奠定基礎。藉着發現中國歷史中「漫長的18世紀」這個起點，本書啟發我們將這一時期視為中國史的分析時段並逐漸瞭解。基於這個起點，未來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認知框架、對具體歷史事件的價值判斷或將隨之更新。

筆者認為，作者之所以能夠出色地實現這一歷史學意義上的重大突破，有賴她看透了「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觀對20世紀人類的影響」，自覺地嘗試以當時當地人的視角而避免以後人之見展開歷史想像。從方法論上來說，這是作者對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達至精神層面的貫徹，是一位懷着深厚人類學同理心的歷史學家的實驗性書寫。其實驗性在於，作者在書中不單寫下她所看到的眾多史料內容，還不遺餘力地向讀者交代這些歷史碎片本身的歷史——他們怎樣被作者發現，可能是誰留下的，怎樣被存留下來，為什麼會出現在那個地方，為什麼是這樣的形式，作者所描述的故事是基於哪些史料等等。讀者在書中讀到的是三重歷史的合奏——黃東們生活的微觀歷史，他們所置身的時代的宏觀歷史，以及他們留下的歷史印記的歷史。前二者的歷史交織已經得到不少史家的重視。而本書作者對上述第三重歷史的關注，幫助她儘可能地穿越時空，接近生活於18世紀的黃東們的生活，懷着同理心而非歷史目的論來倒敘黃東的故事。

三重歷史的寫法令本書具有鮮明的反思性。作者向讀者坦陳自己處理史料的站位，明言自己重建的歷史過程是「可能的情景」，或是深諳「寫文化」之理的人類學家常說的「部分的真相」。她將自己解讀史料的方法總結為「旁敲側擊」尤其形象，說出歷史學家於「無」中尋「有」的努力。筆者理解「旁敲側擊」大概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無」——黃東們要麼因書寫能力欠佳而無力流芳，要麼因不自視為文人而無意流芳，要麼為避免官府注意而不便流芳，我們今天已經不可能聽到他們正面自述的故事；第二層是「有」——作者只能通過他們在工作過程中留下的零碎紀錄或者其他對他們的敘述重建他的生活世界，無疑這些是不同的側面歷史留痕。史家在使用這些側面的史料時，更需用心識別，多做一層轉譯的功夫。作者罕見地把作為轉譯者的自己寫進書裡，甚至巧妙地把書寫者的角度藏在題目。書名「遇

見黃東」雖然省略了「我」這個主語，但作者毫不諱言自己希望借「遇見」一詞表達自己「這個史學學徒與你（黃東）這個歷史人物」之間的扣接。筆者以為，此書與其說是一位歷史學者對黃東等小人物研究的成果，還不如說是學者與歷史人物跨越時空相遇和交往而產生的結晶。

除了史學方法論層面的實驗性，該書關於語言的跨文化傳播機制的研究發現對於現代傳播學頗有啟發。在黃東所生活的時代語境中，普通民眾識字率低下，印刷技術尚未普及，正規英語教育尚未成形，卻發展出口傳心授、「雙向對話」翻譯這樣極具創意的跨文化語言交流方式。這提醒我們注意，無論在怎樣的媒體技術環境下，語言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重要底層基礎。今天，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帶來層出不窮的新鮮傳播現象，這為研究者帶來豐富的研究對象，也對研究者如何在理解新事物的同時不忘回應人類傳播史的基礎問題提出更大的挑戰。網絡媒體用戶在使用中根據特定需要，發展出綜合文字、圖形、聲音媒介等前所未有豐富的語言形式。這些新鮮的語言形式是否衝擊了我們對「語言」的傳統定義？這些多媒介語言帶來什麼新的跨文化交流可能？通訊的便捷和新語言學習工具、互譯系統的出現，是否真的能夠消解語言的文化鴻溝？若歷史深處的黃東們目睹幾百年後的現代人手電話中彈出的表情包，不知他們是否會提出上述這些問題呢？

大概作者並不想把作品的讀者群體局限於學者同行，因而在行文中幾乎不用學術行話，概念化的意願甚為克制。儘管書的結構和內容已經甚為豐滿，筆者出於社會科學訓練的習慣，讀畢有意猶未盡之感，為那些本可以進一步而未進的概念化空間感到有點可惜。為了緩解這種心情，筆者忍不住寫下這篇書評。

嚴麗君

廣東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郭偉全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310頁。

1901年正月初二，山西士人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吾邑洞兒溝，為晉陽一川教民屯聚之巢穴」。(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北